

11825.8
13

吕
思
勉
生
平
与
术

蒿庐问学记

崇高的师表◎
传薪授徒 一片冰心◎
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
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
外王父传◎



深切的怀念 难忘的教诲◎
通贯的断代史家◎
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蒿庐问学记

崇真的高贵*
 传薪授徒——一片冰心*
 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
 试论八朝文学的主源*
 外王父传*



深切的怀念——难忘的教育*
 通贯的断代史家*
 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中的研究*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蒿庐问学记: 吕思勉生平与学术/俞振基著.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6

(近代学人传记)

ISBN 7-108-00862-9

I. 蒿… II. 俞… III. ①史学家-生平事迹-中国②史学
家-学术思想-评论 IV. K82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7547号

责任编辑 曹月堂

封面设计 董 子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6.625

字 数 363 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25.80 元



吕思勉（一八八四年—一九五七年）

倭寇入水道迹泥濱不歸鄉里者累五年空虛什物所失者蓋不
可以數計所以然者初以敵兵守門入門者必鄉之折要予不肯
為說遂不歸後此例雖嚴然租界中究不見敵人驕暴之迹與內
地殊故遂偷息焉及日人攻英租界淪陷敵人之所為亦其其
在內地無異矣三十一年八月乃從吾妻之言歸故鄉時入城門
者雖不必折要然敵兵有門焉必脫帽街衢之中敵兵有更位者
更俗過之亦然予不肯為而無如何故自歸鄉遂不帽誓言吾必
待光復乃戴帽去歲敵人敗降十二月八日在上海買六合帽一
具制以太祖平胡元後所定也三十日戴之昂然歸故鄉矣
揭眉記

呂思勉墨迹

目 录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	汤志钧	一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	杨 宽	四
吕诚之先生的史学著作·····	胡 嘉	三四
吕思勉先生与古代史料辨伪·····	邹兆琦	五四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严耕望	八三
读吕诚之师《医籍知津》·····	胡道静	八九
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	章培恒	九三
热情讴歌祖国进化的史学家——吕思勉·····	俞振基	一〇五
要重视生活方式演变史的研究——读吕思勉史著有感·····	王玉波	一三〇
回忆吕诚之老师·····	钱 穆	一三五
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	黄永年	一三九
怀念吕诚之老师·····	王玉祥	一五一

深切的怀念,难忘的教诲

方德修 一六四

崇高的师表

陈楚祥 一七三

怀念先师诚之先生

顾正武 一七六

忆诚之先生

叶百丰 一七八

传薪授徒 一片冰心——吕诚之先生二三事

杨友仁

李汉怡 一八二

吕诚之先生的为人和治学

钱钟汉 一八五

记吕思勉先生

庄 蕤 一八八

吕诚之先生在无锡国专(沪校)讲课简记

陈祥耀 二〇四

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

吕翼仁 二〇七

回忆吕诚之先生

赵元任 二一六

诚之师纪念馆开幕志庆

唐长孺 二一七

自述

吕思勉 二一八

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

吕思勉 二一八

外王父传

吕思勉 二三八

先考妣事述·····	吕思勉	二四〇
两年诗话·····	吕思勉	二四二
记吕诚之师讲授的国文课·····	黄永年	二五三
吕思勉先生编著书籍一览表·····	方德修	二七六
吕思勉先生著述系年·····	方德修	二八三
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	李永圻	三四五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

汤志钧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卒于一九五七年，终年七十四岁。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史学家，知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盛名。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以及民族史、学术史、史学史等各方面，写了大量著作，已经出版的大约五、六百万字；尚有近百万字札记，正将陆续整理出版。

吕思勉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一九〇五年起，开始任教。一九〇七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在常州府中学堂教历史、地理。一九〇九，经屠寄（敬山）介绍，到张謇创办的南通国文专科学校任教。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教商业经济、商业地理。旋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一九二〇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东北大学）教授。一九二三年，在江苏省立师范学校任教。一九二五年，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一九二六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来增设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在家闭户著作，特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解放后，院系调整，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一级教授，上海历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政协委员。

吕思勉先生自己认为思想凡经三大变：「成童时，最信康（有为）、梁（启超）之说」，「世界愈变必愈善，既愈变而愈善，则终必至于大同而后已」；至于大同世界「究系为何情状，当由何途以赴之」，尚不知考虑，这是第一期。十七岁以后，相信法家中「术家」之说，「以为凡事皆当借政治之力改良之，然政治上之弊病，则皆由于执政者之自利，故非有督责之术，一切政事皆不能行」；至于大同之希望，并未放弃，「但以改善政治，为走向大同之第一步」，这是第二期。四十七岁，开始接触马列主义书籍。解放以后，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用马列主义来检查过去的史学思想，这是第三期。

吕思勉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他基本上运用清乾嘉学者的治学方法，每读一本历史书，都要仔细地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他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吕思勉先生早年用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一九二二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中国通史，对当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起过较大影响。此后，在教学过程中，又写了不少著作，主要有《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史通评》、《中国民族史》、《中国通史》等。

吕思勉先生到晚年，专心一志地想用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劳动，和对二十四史的稔熟，先后写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部份量很重的断代史，《隋唐五代史》即用力十年之久。计划中要写成的《宋辽金元史》，因年老多病，仅存札记，未能写出。

吕思勉先生写的断代史，一般都分上、下两编，上编叙述政治史，实际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基本上采用纪事本末体；下编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尽管不易看清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性，但他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钩稽排比，鉴别考订，给研究者带来很多方便。特别是下编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份，原来资料很分散，经过搜集整理，分门别类，便于检查。

吕思勉先生治学严肃，作风踏实。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尾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参考其他历史书作考订。他并不好奇猎博，而是实事求是。自称：「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清代朴学』对他影响很大。」

吕思勉先生为人诚朴，谦虚谨慎，自称：「著作多依附学校讲义而行，晚年想将普通材料删去，全留独见之处。』惜未编定。不管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向他问学，总是认真答复，绝不敷衍，对青年更时加勉励。临终前因病不能到大学上课，还扶疾编写讲义。吕思勉先生学识的渊博和待人的恳挚，一直为人所称道。」

（原刊一九八〇年《中国史研究动态》第二期。）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

杨 宽

一、生平 and 治学经历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诞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即甲申二月初一；逝世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享年七十四岁。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而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又是刻苦钻研、勤奋著书的一生。在现代我国史学界中，他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史学家。五十年中，他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他多种著作，共约六百万字（不包括尚待整理的稿本），对国内外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他的著作，在国外有多种翻印本广为流传。

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到十二岁随从延聘在家的教师学习，十二岁以后因为家庭经济拮据，由父亲亲自教授，并由母亲和姊姊从旁帮助讲解。练习的写作，则由父亲送请他自己的老师，芜湖中江书院教习薛以庄批改。他在父母母亲的指导下，所读的书，先是《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后一部书读得很认真，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集部读了一半。通过这三

部书的阅读，熟悉了目录学，初步认识了古代史的大略。接着阅读的是《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癸巳类稿》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和写作札记的方法。十五岁那年（一八九二年）考入阳湖县学，成为名义上的旧式县学生。十六岁以后，就自学正续《资治通鉴》、《明纪》以及《文献通考》、《三通考辑要》等书，有系统的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典章制度变迁的历史，为此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二十三岁（一九〇七年）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逐日阅读，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札记。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所作的读史札记，除了对史实作必要的考订以外，十分讲究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着重于探讨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注意摸索重要典章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其变化原因。吕先生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大量有系统、有份量、有见解的著作，不是偶然的，首先得力于他这样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史书和写作札记。

吕先生在穷年累月阅读古文献、埋头写作札记的同时，又爱好广泛阅读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一九二〇年一、二月，《建设杂志》展开中国古代有无井田制的辩论，胡适提出了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认为这是孟子的「托古改制」，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而胡汉民认为这是土地私有未发生前的公产制度；廖仲恺则以为这是土地由公有转变为私有之后的一种残余形态，相当于欧洲中古时期封建主的领地内实行均田受地的方法。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次采用新观点、新方法对古代史展开的辩论。吕先生为了支持廖仲恺的意见，从方

法论上进一步反驳胡适的主张，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给廖仲恺、朱执信的公开信（写于这年五月二十七日），长达七千多字，成为他第一次发表的学术论文。

这时，正当「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展，推翻旧经学和旧史学的斗争刚开始，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也才提出。吕先生在参与这场辩论中，十分讲究研究方法。他反对全盘怀疑古代历史记载，反对完全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认为只需要在考核史料的基础上，依照「社会历史变迁进化」观点作出合理的新解释，就符合历史的真实。一九二〇年底，他在其第一部历史著作《白话本国史》的《序例》中，首先强调的是「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绪论》开头讲的就是社会历史变迁进化观点，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变迁有着因果关系；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同时《序例》还说：「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可知当时作者对采用这种新方法是十分自信的。

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教授历史和国文，因为这个教会学校，气味不相投，教了一年便辞去了。接着回到常州，担任常州府中学堂的教习，教了历史和地理课程二年。一九一〇年由于历史家屠寄（字敬山）的邀请，到南通国文专修科执教一年半。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学习新文化，来到上海，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执教，参考新出版的日文著作，教授商业经济和商业地理两年。虽然因此增长了不少新智识，毕竟和自己的志愿不合。一九一四年暑

假就进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从事编审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等工作，一九一九年又转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在担任编辑工作的五年里，和学者们接触较多，认识到编写通史一类教材的重要性。后来感到编辑工作比较杂乱乏味，不能和自己专心研究的志愿相配合，又重新回到教学工作岗位。一九一九年暑假，由于吴研因的介绍，到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执教。次年，因为沈阳高等师范一再邀请，就到那里担任教授。《白话本国史》一书，就是在历年讲稿的基础上，在这年年底定稿的。在那里共执教三年，到一九二三年张作霖派人接管该校，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不少人视为『不顺』而离开，他也辞职南归，回到苏州的省立第一师范，在新设的培养高等师资的专修科任教，前后有两年半的时间。

一九二五年暑假又来到上海，从此就长期在上海工作。先在沪江大学担任历史教授一年，教授中国哲学史等课，《理学纲要》一书就在这年写成初稿。次年暑假，由于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董伯章的邀请，转到光华大学。那时光华没有历史系，就在国文系担任历史教学；不久历史系成立，就被聘为历史系主任，从此就长期在光华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尽管光华是个私立大学，待遇较差，有时不免欠薪，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以后，欠薪很多，吕先生还是继续在那里任教，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租界，才放弃工作。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到常州旧居，在附近游击区湖塘桥的青云中学、坂上的辅华中学担任教学。因为乡间既不便居住，往来于城乡之间又很不方便，一年后辞去教职，就隐居在常州，继续从事断代史的写作，靠开明书店预支的稿费勉强维持生活。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光华大学复校，就回到光华继续担任历史系主任。直

到上海解放，仍在光华继续任教。后来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就在校校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除了担任教学工作之外，吕先生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他不欢喜交际，曾经说：『予生平不喜访问知名之士，人颇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问学修养也』。他是为了按期完成研究写作计划而『自甘孤寂』，然而，他并没有脱离学术界而孤独地从事研究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很注意学术上的交流的。在光华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逢星期日上午，总是约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们，聚集到一个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随便谈论学问，直到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从没有间断。这是他推进学术研究和诱掖后进的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可以放声高论，畅所欲言，或者探讨某个问题的研究方法和门径；或者追溯一条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或者交流自己研究中的某些心得；或者评论某些著作的缺点错误；或者探讨一些有争论和疑难的问题。吕先生总是侃侃而谈，循循善诱，不少后辈常常从这里得到许多切实的教益。

吕先生又不追求名利地位，他在光华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光华待遇不高，常常欠薪，当时他在学术界声望已很大，先后有不少大学以优越条件来延聘，他都辞谢了。他说是懒于改变环境，实际上是怕改变环境之后，影响原定研究计划的完成。他也不随便写应酬的著作或文章。解放以前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不少，前前后后出版的刊物也多，知名之士往往成为拉稿的对象。吕先生不是有求必应的，

答应写稿是有选择的，力求符合自己的研究志趣和预定计划，因此他在一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数是读史札记，或者是从读史札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文章。他还常常教导有志研究的学生们，不要稍有名望，就放弃自己长期的研究计划，随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写文章或著作，否则就不免误入歧途，结果文章发表不少，名誉也不小，学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

尽管吕先生长期勤奋地按照预定计划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并没有置身于学术界之外，如果遇到讨论重要学术问题自己有不同意见时，就毅然决然出来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九二〇年井田制有无的讨论，他就是第一个以史学家的立场参与的，反驳了胡适否定井田制存在的说法。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东方杂志》二十卷十号），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先生认为「此篇颇伤武断」，又是第一个出来写文章反驳，写成《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发表（《东方杂志》二十卷二十号）。同时，他对于有意义的集体学术工作，也是积极参与的。例如一九四〇年《古史辨》第七册在上海编辑，准备出版，他除了把全部讨论古史传说的论文、札记送登这册《古史辨》以外，还同意作为本册的领衔的编著者，其中三分之一的校样是他一个人独立校阅的，三分之二的校样也是他参与校阅的，因而保证了这册分量很大（八十万字）的书能够迅速出版。这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刊物《齐鲁学报》也在上海编辑出版，他受顾颉刚先生的委托而负责主编，成为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唯一有质量的文史研究刊物，先后出了两期，后来因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而停刊。